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一个荟萃回归分析

谢贞发 张 玮*

摘 要 为了检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实证结果是否受到具体研究特征的影响,文章选取了现有主要实证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结果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尤其是“正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结果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等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通过漏斗不对称检验后发现,样本文献存在发表偏倚问题,且发表偏倚主要发生在支出分权上。

关键词 财政分权, 经济增长, 荟萃分析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兴趣,他们从各个视角、建立各种理论试图诠释中国持续多年的高增长奇迹。在种种解释因素中,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例如使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企业管理中引入物质激励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各种价格改革、技术引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市场开放政策、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安排等。其中,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改革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在中国这样的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国家中,财政分权赋予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强大激励,因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成为众多经济学者研究的焦点。

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财政体制的变更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财政体制经历了数次大的变迁:中央集权型的统收统支—行政性分权型的财政包干—经济性分权型的分税制。

*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通信作者及地址:谢贞发,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361005;电话:13459248303;E-mail: xzf@xmu.edu.cn。本文受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0zd&036)和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110)的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从集权型财政体制转向分权型财政体制是一个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对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改革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经济增长呢?这一问题是目前中国财政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同时,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财政分权的未来改革走向至关重要。若诚如拥护者所言,中国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今后的改革就应该致力于进一步巩固分权改革的成果并将之制度化;相反,若中国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那么就on应该实行更为集中的财政体制,或者在其他领域里进行相应的改革,以使分权化的财政制度的好处更好地发挥出来。

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经历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其中,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财政分权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许多研究者还以中国奇迹为例,应用该理论论证了“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结论。虽然这一理论占据了主流地位,但近年来也开始不断地受到各方面的批判。理论争议的正确与否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相应的实证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了。随着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逐步推进及相应效应的逐步显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现有的实证研究文献的结论并不是一致的,存在较大的争议。同时,不同的实证研究可能与其具体研究特征相关,如指标选择、样本量、时间跨度、区域范围、计量方法等,从而使得同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例如,同样是研究国有企业改制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Jefferson and Su (2006)的研究发现改制后资本劳动比下降了,而白重恩等 (2006)¹的研究却发现改制后资本劳动比上升了。白重恩等人认为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1)样本量和样本区间的差别;(2)样本企业改制形式的差异等。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在比较分析现有实证文献的研究特征和结论差异基础上,利用荟萃回归分析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方法,探究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与其具体研究特征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适应性。

荟萃回归分析是对实证研究文献进行评价、综述的一种有用工具,是指依靠搜集已有或未发表的具有某一可比特性的文献,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系统性的定量分析 (Weichselbaumer and Winter-Ebmer, 2005)。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荟萃回归分析方法被引入后,它就被应用于经济学文献研究中。Stanley and Jarrell (1989) 列示了引起同一主题实证研究的结果变化的可能原因,它们大体可以被归入三大类 (Bel and Fageda, 2009):

¹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 年第 8 期,第 4—13 页。

(1) 统计方法的特征；(2) 模型误差的偏差；(3) 特定研究的数据集的具体特征等。目前荟萃回归分析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研究各种经济问题之中： β 收敛假说 (Breuss and Eller, 2004; Groot and Florax, 2005)、国际工资性别差距 (Weichselbaumer and Winter-Ebmer, 2005)、移民对工资的影响 (Longhi *et al.*, 2005)、地方民营化的解释因素 (Bel and Fageda, 2009)、FDI 与税制 (Feld and Heckemeyer, 2011) 等。

据我们所知，虽然国内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综述文章较多，但还没有发现有文献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详细的荟萃回归分析，因此，本文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研究结论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而且在样本文献中存在发表偏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理论争议；第三部分是对现有主要实证研究文献的梳理；第四部分是对样本文献的荟萃分析；第五部分是发表偏倚的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争议

全球范围内的多层级政府的存在性及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化趋势，引发学术界对财政分权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议，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同期的财政分权趋势的共存性，更激发了学者们的热议。

(一)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又称为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或古典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主要是从经济维度强调财政分权在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上的优势，从而论证了多层级政府存在的经济合理性。其主要思想来源有两个（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²。一个是 Tiebout (1956) 所强调的居民通过“用脚投票”来引发类似市场竞争的辖区间竞争，从而成为解决政府税收、公共产品供给与居民偏好相匹配问题的基本机制；另一个是 Hayek (1945) 的“分散性知识”要求决策权与知识对称分布的理论，强调居民对公共产品偏好的地域异质性以及中央政府对此知识的缺乏，因此即便不考虑辖区间竞争，把公共产品供给和相应的财权尽量下放给地方就能提高社会福利，除非某种公共产品有很大的地区间溢出效应 (Musgrave, 1959; Oates, 1999)。

虽然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为政府间分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但自产

² 杨其静、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经济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99—114 页。

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诟病。一是批评它的假设条件过于苛刻(比如, Tiebout 模型假设要素和人员的完全流动性、充分的信息等), 与现实不符, 从而引发对其理论成立的质疑; 二是批评其忽视了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 类似于新古典企业理论, 将政府作为“黑箱”处理, 假设政府是仁慈的, 天然地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市场 (Qian and Weingast, 1996); 三是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不大, 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关注的是一般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问题, 而不是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虽然一些学者 (张璟和沈坤荣, 2008³; 周业安和章泉, 2008a⁴) 从优化资源配置角度认为其论证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1960 年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尤其是 North 等人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研究发现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而国家 (地区) 间竞争是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North, 1990; North *et al.*, 1973; North and Weingast, 1989), 引发了众多学者对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因素的研究。Weingast (1995) 等人以英美等国的发展历史为背景, 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系统地提出了“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MPF), 强调中央-地方分权及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可促使地方政府构建友好的商业环境,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杨其静, 2010)⁵。不同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强调了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 因此也被称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Qian and Weingast, 1997)。

虽然 MPF 提供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合理理论逻辑, 但针对 MPF 的批评也随即而起。现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 MPF 的五个特征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些特征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以及由分权和辖区间竞争所产生的负效应等 (杨其静和聂辉华, 2008)⁶。

(三)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

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功, 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因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更多的是论证多层级政府存在的经济合理性, 且主要以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 (尤其是美国) 为现实背景, 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而第二代分权理论则主要论证的

³ 张璟、沈坤荣,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江苏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3 期, 第 56—62 页。

⁴ 周业安、章泉,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波动”, 《管理世界》, 2008 年第 3 期, 第 6—15 页。

⁵ 杨其静, “分权、增长与不公平”, 《世界经济》, 2010 年第 4 期, 第 102—120 页。

⁶ 杨其静、聂辉华, “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 基于文献的一个思考”, 《经济研究》, 2008 年第 3 期, 第 99—114 页。

是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强调了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而这一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又为该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检验基础。因此，第二代分权理论的代表人物（如 Weingast、钱颖一等人）将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中国特色联邦主义”（Montinola *et al.*，1995），他们认为：虽然中国的政治分权不同于西方联邦体制（如中国模式与个人权利和政治自由无关），但是它基本满足“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五个条件。

基于中国 1980 年以来的分权改革，这些学者系统地对中国式 MPF 的优势进行了理论分析。（1）延续 Dewatripont and Maskin（1995）关于信贷市场上分权可以强化预算约束的研究，证明分权和辖区间竞争可以迫使政府减少对无效率国企的补贴和救助，加快国企的民营化改革，增加对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投资（Qian and Roland，1998）。（2）财政分权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成为“剩余索取者”，并有了追求地方税收最大化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Qian and Xu，1993；Jin *et al.*，2005）。（3）Qian and Weingast（1997）认为财政包干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承诺，主要是分权形成的地方政府对流动资源的竞争起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种限制政府掠夺行为的正激励和减少软预算约束问题的负激励，从而维护了经济权利和保护了市场。（4）分权下的中国 M 型政府组织结构相比俄罗斯等国的 U 形结构，有利于小规模试验，从而可以走渐进改革的道路（Qian and Xu，1993；Qian and Roland，1998）。（5）中国特殊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模式，形成以 GDP 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和官员晋升制度，产生特殊的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张军等，2007）⁷或“政治锦标赛”（周黎安，2004⁸；2007⁹）机制，较好地解决了地方政府业绩测度的信息问题，赋予了地方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强激励。

虽然许多学者论证了中国式 MPF 的优势，但 Cai and Treisman（2006）基于中国实践重新审视了这些观点，发现没有一个观点在分权与中国发展成功间建立了可信的联系。他们提出解释中国改革过程的另一种视角，即促进增长的政策产生于亲市场和反市场派别的竞争中。而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被认为是中央政府重新集权的改革，使得地方政府的剩余索取额下降，从而激励机制发生了变化，因此，陈抗等人（2002）¹⁰担心地方政府的“援助之手”有向“攫取之手”转变的趋势（税费从预算内向预算外、制度外转移）。

近年来，随着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逐步推进及其影响效应的日益显现，

⁷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4—19 页。

⁸ 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33—40 页。

⁹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第 36—50 页。

¹⁰ 陈抗、A. L. Hillman、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 年第 2 卷第 1 期，第 111—130 页。

人们在分享财政分权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也开始承受其带来的诸多损害社会和谐的产品。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和强调财政分权改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1)可能引发辖区间发展失衡和地方保护主义(Young, 2000; 周黎安, 2004),导致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王永钦等, 2007)¹¹; (2)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经济建设性支出而大大压缩了对教育、医疗卫生等一般性公共产品的供给(Qian and Roland, 1998; 傅勇和张晏, 2007)¹²; (3)引发恶性竞争,即地方政府间竞相降低税率和环境监管标准(Oates and Schwab, 1988; Oates, 1999; Revesz, 2001)等。

三、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证据

虽然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的问题还存在争议,但“中国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观点还是占据主流地位的。那么,这个理论命题是否得到了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换言之,1980年以来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财政分权改革是不是确实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那么,综合来看,这些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否支持了主流理论命题?它们又有哪些具体研究特征?这些问题是本部分所关注的重点。

为了选取进行比较分析的实证文献,我们重点检索了清华 CNKI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以及 sciencedirect 电子期刊检索数据库。其中,在中文数据库中检索题目、关键词、摘要涉及(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等;在英文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为:federalism、(fiscal) decentral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等,共搜集到 3 053 篇相关文献,其中包括中外学者对世界各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再在结果中筛选出以中国大陆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共 455 篇。由于大部分文献是理论研究文献或者文献综述、评论,不符合本文所需的实证文献要求,予以剔除;剩余的文章中许多没有建立回归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予以剔除;还有一些文献的主题与研究侧重点与本文要求不一致,予以剔除;最后,剔除掉部分质量较低的文献¹³,最终剩余 38 篇质量较高的关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文章。

进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财政分权指标的选取问题。现有文献主要有三种度量中国财政分权的方法:一是财政收入分权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二是财政支出分

¹¹ 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经济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4—16 页。

¹² 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 年第 3 期,第 4—12 页。

¹³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剔除存在损失重要文献的风险。当然,这是荟萃回归分析必须承受的风险。

权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三是采用地方政府自有收入的留成比率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表 1 汇总了现有实证文献中所采用的主要财政分权指标公式¹⁴。

表 1 现有文献中所采用的主要财政分权指标¹⁵

指标类型		指标公式
财政收入分权	预算内	人均预算内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内中央政府财政收入
		人均预算内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内全国财政收入
	预算外	人均预算外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外全国财政收入
	预算内外	人均预算内外省级政府财政收入/人均预算内外全国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分权	预算内	人均预算内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中央政府财政支出
		人均预算内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全国财政支出
	预算外	人均预算外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外全国财政支出
	预算内外	人均预算内外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人均预算内外全国财政支出
财政分成率	平均分成率	省级政府在预算收入中保留的平均份额
	边际分成率	省级政府从其财政收入增加额中保留的百分比
	分成率比例	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省级政府财政收入
		中央政府（全国）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全国）财政收入

注：（1）指标公式以省级为基础是因为现有实证文献的分权指标大多采取了省级指标。（2）财政收支分权指标以人均来表示，这是大部分文献的一致做法，虽然有些文献也考虑了总量分权指标。（3）“人均全国财政收支”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均各省财政收支+人均中央财政收支；二是按全国人口平均的全国财政收支。文献大多采取了第一种分权指标。

除了财政分权指标外，另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因变量。现有文献主要有两种经济增长指标：一是名义 GDP 增长率，二是实际 GDP 增长率。因为名义 GDP 增长率没有剔除价格因素，因而其衡量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不准确的风险，因此，大部分文献采取的是实际 GDP 增长率（由表 2 中可以发现，采取实际 GDP 增长率的实证模型有 38 个，而采取名义 GDP 增长率的只有 16 个）。

现有文献对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得出了一致结论？不同的分权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选择的结果是否一致？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按照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指标进行分类，把 38 篇文献的模型结论按时间跨度进行归类整理，具体结果见表 2。

¹⁴ 有些文献（代表性的如：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2012 年第 6 期，第 43—59 页。）采取“财政自主度=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收入/省本级预算内财政总支出”作为财政分权指标。

¹⁵ 一些文献还特别考虑了转移支付情况，如张晏和龚六堂（2005），但由于数据原因，考虑这种情况的文献并不多。

表 2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文献综述

变量	具体衡量指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前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后			全样本			合计
		正向效应	负向效应	不显著	正向效应	负向效应	不显著	正向效应	负向效应	不显著	
		4	7	4	13	8	4	10	1	3	
因变量	实际 GDP 增长率	1	7	3	10	8	2	4	1	2	38
	名义 GDP 增长率	3	0	1	3	0	2	6	0	1	16
财政分权 指标	财政收入分权	0	5	3	6	4	1	4	0	2	25
	财政支出分权	3	7	4	13	6	4	9	0	3	49
	财政分成率	1	0	0	0	1	0	2	1	0	5

注：(1) “全样本”指的是时间跨度包括了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前后时期且没有做分样本的模型估计。(2) 有些文献既有 1994 年之前时期的模型估计,又有 1994 年之后时期的模型估计,这会增加总模型数。(3) 有些文献的实证模型的财政分权指标既包含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又包括财政收入分权指标,这也会增加总模型数。

由表2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

第一，在财政分权指标选择上，大多数模型采取的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其中，采取财政收入分权指标的有25个、财政支出分权指标的有49个、财政分成率指标仅为5个，说明以财政支出分权指标作为衡量中国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获得了较多学者的认可。

第二，从现有实证结果来看，一半实证结果支持了中国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命题。54个模型结果中27个显示正效应、16个负效应、11个不显著。但按时段分类来看，结果则存在明显差异。（1）1994年前的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多的是负向的，15个模型结果中有7个是负向效应、4个正效应、4个不显著。（2）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则更多是正向的，25个模型结果中有13个是正效应、8个负效应、4个不显著。（3）从跨期效应（包括1994年前后的时间跨度）来看，即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上来看，正向效应占据主导，其中14个模型结果中有10个是正效应、1个负效应、3个不显著。其中有两篇文献（Feltenstein and Iwata, 2005；周文兴和章铮，2006¹⁶）值得特别注意，他们分别检验了1952—1996年、1953—2002年长时期的效应，结果都显示为正向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财政分权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的论点。

综合现有实证研究，我们还难以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虽然正向效应的结果占了50%的比重。另外，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是否受到具体研究特征和变量选取的影响呢？如财政分权变量的选择是否会影响实证结果呢？为了研究相关文献研究特征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我们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荟萃分析。

四、荟萃分析：数据、方法与估计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利用荟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现有实证研究结果与其具体研究特征的关系，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回归变量。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我们选择以下三个因变量：显著性、正向显著性和负向显著性。用于荟萃回归分析的因变量的值由 t 统计量判断实证研究文献中变量间的（方向）显著性关系后赋值（Stanley and Jarrell, 1989）。

（1）显著性。当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时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

¹⁶ 周文兴、章铮，“建国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假说及检验”，《制度经济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5—146页。

（2）正向显著性。当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3）负向显著性。当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本文选取的调节变量（moderator variable）包括：样本数量、数据搜集的起止年份、区域范围、估计方法、实际经济增长率、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财政支出分权以及文献模型数量权重。调节变量中的前五个变量是一般荟萃分析所选取的变量，体现的是各实证研究文献的基础特征。实际经济增长率、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财政支出分权等变量是为检验现有实证结果是否受到指标选择和因素考虑的影响。文献模型数量权重是在同一篇文献中提取多个模型数的倒数，这一变量的选取参考了 Weichselbaumer and Winter-Ebmer（2005）所采取的处理同一篇文献中提取多组数据时可能产生误差问题的方法。¹⁷

本文构建的用于荟萃分析的样本集是在 38 篇实证文献的基础上获得的。其中，有 11 篇文献不符合荟萃回归分析的需要，无法提取相关数据，将之去除。最终，本文荟萃回归分析所用到的数据来自 27 篇主题相同且具有较高质量的文献。表 3 列示了用于荟萃分析的变量与数据的基本信息。

表 3 用于荟萃分析的变量描述

因变量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显著性 (Significance)	虚拟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性影响则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73	0.45
正向显著性 (Positive)	虚拟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则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45	0.50
负向显著性 (Negative)	虚拟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向的显著性影响则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28	0.45
调节变量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Sample)	文献模型中的观察值数量	373.98	194.21
起始年份 (Start)	文献模型所搜集数据的起始年份	1987.86	7.54
终止年份 (End)	文献模型所搜集数据的终止年份	2000.36	5.70
区域 (Region)	文献模型中所研究的我国分省数据所涉及的省份数量	28.89	0.98
估计法 (FE)	虚拟变量：当模型估计方法为线性固定效应模型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83	0.38

¹⁷ 一篇实证研究文献中往往会对相似或者相同变量采用不同的模型进行回归估计，有时实证结果也会有多个，但是同一篇文献的研究特征大部分是相同的。研究特征作为调节变量在每组数据中一样，会造成数据相互间的不独立问题，它们在荟萃回归估计中会使误差项受到影响。

(续表)

调节变量	描述	均值	标准差
实际经济增长 (Yreal)	虚拟变量：当模型因变量为实际 GDP 增长率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67	0.47
劳资增长率 (K/L)	虚拟变量：当模型解释变量含有劳动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84	0.37
其他改制 (Revolve)	虚拟变量：当模型解释变量考虑我国同时期其他改制的影响时赋值为 1，其余为 0	0.36	0.48
预算内资金 (Budget)	虚拟变量：当模型考虑的是我国预算内财政收支数据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83	0.38
财政支出分权 (Expend)	虚拟变量：当模型考虑的是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时赋值为 1，其余赋值为 0	0.72	0.45
权重 (Weight)	每篇文献中模型数量的倒数	0.42	0.33

注：“其他改制”包括引言中提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市场开放政策改革等。

(二) 方法

根据一般荟萃回归方程的模式，我们构建了以下荟萃回归估计方程：

$$\text{Significance} = F\left(\text{Sample, Start, End, Region, FE, Yreal, K/L, Revolve, Budget, Expend, Weight}\right), \tag{1}$$

$$\text{Positive} = F\left(\text{Sample, Start, End, Region, FE, Yreal, K/L, Revolve, Budget, Expend, Weight}\right), \tag{2}$$

$$\text{Negative} = F\left(\text{Sample, Start, End, Region, FE, Yreal, K/L, Revolve, Budget, Expend, Weight}\right). \tag{3}$$

由于因变量是二元虚拟变量，所以我们应用 Probit 模型分别对每组变量进行荟萃回归估计。

(三) 估计与结果

表 4 是以“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调节变量“区域、劳资增长率、预算内资金”的系数具有不同水平的显著性，表明它们对实证结果有显著影响；相反，其他调节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它们并未显著影响实证研究结果。

“区域”变量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实证研究结果，说明省份数量的增加会增加显著性效应的概率，但其系数为 0.567，影响并不是很大；“劳资增长率”的系数为 -2.257，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增加“劳动增长率及资本增长率”变量会显著降低实证研究中显著性效应的结果，这说明劳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若遗漏该变量则会扭曲实证研究结果；“预算内资金”的系数为 1.304，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采用只考虑预算内资

金的财政收支分权指标会显著增加显著性效应的概率。

表 4 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荟萃回归估计结果

调节变量	因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
样本量	0.006 (0.005)
起始年份	0.175 (0.147)
终止年份	-0.147 (0.157)
区域	0.567 (0.299) *
估计法	-0.457 (0.888)
实际经济增长	1.020 (0.658)
劳资增长率	-2.257 (0.844) ***
其他改制	0.853 (0.571)
预算内资金	1.304 (0.523) **
财政支出分权	-0.055 (0.494)
权重	0.815 (1.035)
常数项	-72.178 (79.642)
伪 R^2	0.317
对数伪似然值	-25.318
χ^2 （联合显著性）	24.75 ***
N	6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异方差稳健）；***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 5 是以“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调节变量“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具有不同水平的显著性，表明它们对实证结果有显著影响；相反，其他调节变量的系数都不显著，表明它们并未显著影响实证研究结果。

表 5 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的荟萃回归估计结果

调节变量	因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显著影响
样本量	0.002 (0.004)
起始年份	0.025 (0.125)
终止年份	0.087 (0.119)
区域	0.381 (0.231) *
估计法	-0.697 (0.631)
实际经济增长	-0.253 (0.562)
劳资增长率	-1.577 (0.572) ***
其他改制	1.231 (0.443) ***
预算内资金	1.102 (0.670) *
财政支出分权	0.308 (0.456)
权重	-0.869 (0.802)
常数项	-234.192 (88.406) ***
伪 R^2	0.341
对数伪似然值	-29.031
χ^2 （联合显著性）	30.83 ***
N	6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异方差稳健）；***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与表 4 的结果类似的是，“区域”变量和“劳资增长率”变量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水平是一样的，说明它们也显著影响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正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结果；“预算内资金”的影响方向与表 4 是一致的，但显著性水平下降为 10%；与表 4 不同的是，“其他改制”变量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正向影响了实证结果，说明在控制了其他改制的影响时，财政分权改革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概率会显著上升。

表 6 是以“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显著影响”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实证结果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其他调节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 6 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显著影响的荟萃回归估计结果

调节变量	因变量：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向显著影响
样本量	-0.001 (0.004)
起始年份	0.045 (0.119)
终止年份	-0.147 (0.126)
区域	0.0067 (0.253)
估计法	0.465 (0.653)
实际经济增长	1.052 (0.500)**
劳资增长率	-0.079 (0.621)
其他改制	-0.310 (0.501)
预算内资金	0.588 (0.628)
财政支出分权	-0.602 (0.439)
权重	1.692 (0.838)**
常数项	202.756 (85.897)**
伪 R^2	0.270
对数伪似然值	-27.761
χ^2 （联合显著性）	22.16**
N	6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异方差稳健）；***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综合上述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研究结果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其中，“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正向显著效应”受到多个研究特征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实证研究时特别注意一些因素的考虑及变量的选择；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负向显著效应”仅受到因变量选择（经济增长率指标）的影响，不受其他研究特征的显著影响，但对这一结果需要特别谨慎，因为从表 2 中可知，负向效应的实证样本比较有限，从而可能影响荟萃分析的有效性。

五、发表偏倚估计

在进行荟萃回归分析时可能会遇到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的问题，即一般来说能够得出显著性的实证结果的论文更容易被发表（Stanley, 2001；

2005)；另外，对于无统计学意义的研究，研究者可能认为意义不大，因而不发表或推迟发表。发表偏倚较大会大大降低荟萃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此，Stanley（2005；2008）指出，在荟萃回归中可以采用漏斗不对称检验（funnel asymmetry tests, FAT）来检测发表偏倚问题。这些检验是基于一项研究的报告效应与其标准差之间的估计。因此，我们估计以下方程：

$$T_i = \beta_0 + \beta_1 (1/SE_i) + \epsilon_i.$$

(4)

T 是一篇文献中报告的 t 统计量， $1/SE$ 是标准差的倒数（Stanley，2005；2008）。截距项 β_0 为测试发表偏倚的指标，且它的符号显示偏倚的方向。当 β_1 显著不为 0 时，则可发现发表偏倚存在的证据；反之则可以认为不存在发表偏倚。另外， β_1 的统计显著性提供了真实的实证效应估计。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我们主要检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倚，因此需要选择合适的解释变量。我们已经知道，财政分权指标主要有三种，其中财政分成率指标在现有实证应用中很少，所以不宜作为单独的解釋变量。我们选择了三个解释变量：所有分权指标、财政收入分权指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我们在估计方程（4）中分别检验不同财政分权指标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是否存在发表偏倚的问题，数据是文献中报告的相应分权指标的 t 统计量和标准差。

由表 7 可知，所有分权指标的 t 统计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 β_0 估计值在 10% 水平上显著不为 0 ($\beta_0 = 0.87$)，意味着发表偏倚的存在，且 β_0 为正表明实证结果越显著的文献越可能被发表，而 β_1 系数不显著也意味着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可能没有反映真实的经验效应；从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的检验结果来看，发表偏倚主要发生在支出分权上，且存在显著的正向偏倚，即显著为正的实证结果更可能被发表，而收入分权则没有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倚问题。当然，收入分权的样本数量过低，我们需要谨慎对待这一结果。

表 7 漏斗不对称检验（OLS）结果

解释变量	因变量： t 统计量		
	所有分权指标	收入分权	支出分权
截距项	0.87 (0.49)*	-0.46 (0.88)	1.41 (0.61)**
1/SE	0.0002 (0.0002)	0.002 (0.0005)***	0.0001 (0.0002)
N	60	17	41
R ²	0.002	0.043	0.001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异方差稳健）；*** 表示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性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性水平。

六、结 论

在关于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议中，虽然第一代财政分权理

论解释了多层级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分权的经济效率，但它基本没有研究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问题；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它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经济奇迹成为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重要佐证，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式市场保护型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模式。但对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争议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同样，对于中国财政分权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的争议也一直存在。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认为中国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随着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逐步推进和效应的逐步显现，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不断涌现。但纵观现有实证文献，我们发现结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有一半的文献支持了主流观点。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梳理比较现有主要实证文献的结果差别，通过荟萃回归分析研究这些实证结果是否受到具体研究特征的影响，并运用漏斗不对称检验方法验证发表偏倚的存在性。

我们的荟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同实证研究结果受到不同研究特征的影响，其中，“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显著性效应”的实证结果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预算内资金”的显著影响；“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正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受到“区域、劳资增长率、其他改制、预算内资金”的显著影响；而“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负向显著效应”的实证研究结果仅受到“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显著影响。通过对所有分权指标、财政收入分权指标、财政支出分权指标的漏斗不对称检验，我们发现，在样本文献中存在发表偏倚问题，且发表偏倚主要发生在财政支出分权上。这些结果表明，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尤其是正向显著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关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还难于根据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一个可以作为政策依据的可靠证据。因此，它不仅要求理论上廓清争议¹⁸，更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参 考 文 献

- [1] Bai, C., J. Lu, and Z. Tao,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Ownership Reform in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6, 8, 4—13. (in Chinese)
- [2] Bel, Germà, and X. Fageda, “Factors Explaining Local Privatization: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Public Choice*, 2009, 139(1—2), 105—119.
- [3] Breuss, F., and M. Eller,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s There Really a Link?”, *Journal for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s*, 2004, 2(1), 3—9.

¹⁸ 也许跳出财政分权，从更宽广的分权化改革视角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更有利于理清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作者感谢审稿人对这点的提示。

- [4] Cai, H., and D. Treisman, "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World Politics*, 2006, 58(4), 505—535.
- [5] Chen, K., A. Hillman, and Q. Gu,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and Behavioral Change of Local Governments: From the Helping Hand to the Grabbing Hand",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2, 2(1), 111—130. (in Chinese)
- [6] Chen, S., and L. G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easuri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Revaluating Its Action Mechanism", *Management World*, 2012, 6, 43—59. (in Chinese)
- [7] Dewatripont, M., and E. Maskin,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5, 62(4), 541—555.
- [8] Feld, L., and J. Heckemeyer, "FDI and Taxation: A Meta-Study",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1, 25(2), 233—272.
- [9] Feltenstein, A., and S. Iwata,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Regional Autonomy Has Its Cos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5, 76(2), 481—501.
- [10] Fu, Y., and Y. Zhang, "Chinese Style Decentralization and Deviations of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The Price of Competition for Growth", *Management World*, 2007, 3, 4—12. (in Chinese)
- [11] Groot, M., and R. Florax, "A Meta-Analysis of β -Convergence: The Legendary 2%",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5, 19(3), 389—420.
- [12] Hayek, F.,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 35(4), 519—530.
- [13] Jefferson, G., and J. Su, "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China: Evidence from Shareholding Ownership, 1995—200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6, 34(1), 146—166.
- [14] Jin, H., Y. Qian, and B.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10), 1719—1742.
- [15] Jin, J., and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signments and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5, 16(6), 1047—1064.
- [16] Li, H., 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9), 1743—1762.
- [17] Longhi, S., P. Nijkamp, and J. Poot,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 of Immigration on Wage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5, 19(3), 451—477.
- [18] Ma, J.,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97.
- [19] Maskin, E., and J. Riley, "Asymmetric Auction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3), 413—438.
- [20] Montinola, G., Y. Qian, and B. Weingast,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5, 48(1), 50—81.
- [21] Musgrave, R.,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 New York: McGraw-Hill, 1959.
- [22] North, D., "A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of Polit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90, 2(4), 355—367.
- [23] North, D., and B.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9, 49(4), 803—832.

- [24] North, D., R. Thomas, and J. Shneidman,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25] Oates, W.,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9, 37(3), 1120—1149.
- [26] Oates, W., and R. Schwab,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Jurisdictions: Efficiency Enhancing or Distortion Inducing?",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88, 35(3), 333—354.
- [27] Qian, Y., and B. Weingast, "China's Transition to Market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1996, 1(2), 149—185.
- [28] Qian, Y., and B.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4), 83—92.
- [29] Qian, Y., and C.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993, 1(2), 135—170.
- [30] Qian, Y.,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 1143—1162.
- [31] Revesz, R., "Federalism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Public Choice Analysis", *Harvard Law Review*, 2001, 115(2), 553—596.
- [32] Stanley, T., "Meta-Regression Methods for Detecting and Estimating Empirical Effects in the Presence of Publication Selection",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8, 70(1), 103—127.
- [33] Stanley, T., "Wheat from Chaff: Meta-Analysis as Quantitative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3), 131—150.
- [34] Stanley, T., "Beyond Publication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5, 19(3), 309—345.
- [35] Stanley, T., and S. Jarrell,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A Quantitative Method of Literature Surveys",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89, 3(2), 161—170.
- [36] Tiebout, C.,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5), 416—424.
- [37] Wang, Y., Y. Zhang, Y. Zhang, Z. Chen, and M. Lu, "On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hina's Decentralization Approach to Transition",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1, 4—16. (in Chinese)
- [38] Weichselbaumer, D., and R. Winter-Ebmer, "A Meta-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nder Wage Gap",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5, 19(3), 479—511.
- [39] Weingast, B.,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5, 11(1), 1—31.
- [40] Yang, Q., "Decentralization, Growth and Unequ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0, 4, 102—120. (in Chinese)
- [41] Yang, Q., and H. Nie,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Criticism on I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8, 3, 99—114. (in Chinese)
- [42] Young, I.,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3] Zhang, J., Y. Gao, Y. Fu, and H. Zhang, "Why Does China Enjoy So Much Better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3, 4—19. (in Chinese)
- [44] Zhang, T., and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67(2), 221—240.
- [45] Zhang, Y., and L. Gong, "The Fenshuizhi Refor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5, 5(1), 75—108. (in Chinese)

- [46] Zhou, W. ,and Z. Zha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 New Hypothesis and Time Series Test”,*Resear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2006,1,135—146. (in Chinese)
- [47] Zhou,L.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7,7,36—50. (in Chinese)
- [48] Zhou,L. ,“The Incentive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longed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Duplicative Investments in China”,*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04,6,33—40. (in Chinese)
- [49] Zhou,Y. ,and Q. Zhang,“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Fluctuation”,*Management World*,2008,3,6—15. (in Chines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ZHENFA XIE* WEI ZHANG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der to scrutinize whether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s 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re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fic studies, this paper has selected some high-quality empirical studies for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ome empirical results were correlated with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udies, especially that the result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elping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region, K/L, revolve, budgetary”. By means of the funnel plot asymmetry analysis,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some publication biases in the sample studies, which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issue of fiscal expenditure decentralization.

JEL Classification H77, O12, P35

*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fa Xie, Department of Public Economics,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422 Siming South Road,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Tel:86-13459248303; E-mail:xzf@xmu.edu.cn.